

五四精神對中共的負面影響

從五四運動本質透視

周玉山

一、五四運動的本質與精神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青年的呼聲打破了故都的寂靜，趙家樓的火焰燒紅了無數沸騰的心，稍後羅家倫先生以親歷者的身分，指出這場運動的真精神有三：（一）學生犧牲的精神。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或受傷，或被捕，或憤死，或急瘋，此種犧牲精神不滅，是再造中國的元素。（二）社會制裁的精神。當時中國昏亂，法律既無效力，政治又極黑暗，賣國官員深宅大院，衛兵如林，似乎神聖不可侵犯，結果被學生嚇得像喪家之犬，方知社會制裁的厲害，中國因此而有轉機。（三）民族自決的精神。中國人外受列強壓制，內受暴力壓制，原已奄無生氣。此次學生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對外自決的第一聲；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堪稱雙重保險的民族自決運動(1)。上述第三種精神主要為民族主義，第二種精神為民權精神，皆可透見五四運動的原始目的，即永垂不朽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八字。至於第一種精神，自為五四一役的動力，且有代代相傳的知識青年篤行踐履，形成可貴的傳統。

五四運動經擴大解釋後，五四精神也有了更為寬廣的天地，從愛國的、政治的出發點，兼及思想的、文化的層次。當日的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先生其事隔廿四年後覺得，五四未嘗不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一個永久崖層(2)。積累文化猶如積山，不必除去原有者，而於其上更加一層，然後可以後來居上，越久越高；如將舊者拆去，重新自平地建設起來，則後人無法勝過前人。試觀現代歐美的文化，有希臘人的遺物，大多偏於哲學；有羅馬人的遺物，大多偏於法律；有文藝復興時代的遺物，大多以人的自覺為主；有啟蒙時代的遺物，大多以人的求知尋理為主；有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遺物，即自由平等博愛。其中儘可這裏修改一處，那裏補進一塊，然而必為層層堆積者，才有現代之富。五四的遺物帶著法國大革命的色澤，也包括啟蒙時代的成分，民主與科學即其要項。

五四運動後不久，新文化運動一詞逐漸流行起來，孫中山先生也號召國民黨員予以支持，一九二〇年一月廿九日，他致函海外同志時指出：「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攔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

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其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3)此處所謂「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主要即指「新青年」雜誌。主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一九一七年由蔡元培接長後，重視思想自由和學生自治，也造成「新青年」同仁與北大的結合，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胡適、周作人、吳虞、魯迅、李大釗等都前往任教，極一時之盛。蔡校長是一位革命者和愛國者，感召青年對抗當時腐敗的政治(4)；又是一位強烈的知識追求者，成為青年思想文化的引路人(5)。由此可見，政治的興替和民主科學的提倡，實賴覺悟的出版界和自由的學風鼓吹。

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孫中山先生即命戴季陶、沈玄廬、孫棣三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宣揚新思想，被視為北京「新潮」月刊的姊妹品(6)。此時國民黨人葉楚傖主持的「民國日報」也改用白話文，並闢「覺悟」副刊，一新讀者耳目。同年八月一日，孫先生又派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廖仲愷、朱執信創辦「建設」雜誌，介紹實業計畫和全民政治，討論婦女問題和革命意義等，為新文化運動注入新血，甚獲胡適和傅斯年的好評，後者更舉之與「新青年」等量齊觀。孫先生素重宣傳，以印

刷工業為滿足人民求知慾的要件，是傳播文化的一大因子，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即創辦「民報」，影響極為深遠，五四運動則堅其信念，繼續著書立說，建國方略遂告終篇，其中實業計畫列舉民生工業有五，除食衣住行外，即為印刷。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七日，他開始演講三民主義以啓迪人心，隨後並予出版，立即風行海內。五四運動的主將如羅家倫、段錫朋、楊亮功、陶希聖等先生，也紛紛加入中國國民黨，投身國民革命的行列。五四運動本為民族統一運動，旨在實現現代化的民族國家(7)，與孫先生的主張若合符節，兩者遂密不可分。文字收功日，中國革命潮，此之謂歟？

綜上所述，可知五四運動的原始動機在護土救國，本質上是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革命，目的在喚起民衆，躋中國於自由平等、富強康樂之境。欲達此目的，首須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次須實行民主，發展科學，數十年來，已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違反民主的政權，既不以民意為基礎，則人民非其資產，知識分子尤屬債主了。

中共在野時多方利用五四運動，執政後則遭五四精神的衝擊，可謂天道好還。五四精神對中共的負面影響，先後表現在五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七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八十年代的新一二九運動上，彼此內容固不盡同，但抗議精神一致，值得加以探討，做爲五四運動與中共關係的總結。

二、從新五四運動到新一二九運動

一九五五年底，中共發動了「肅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多達一百四十萬人以上。次年五月，毛澤東提出旨在安撫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口號；一九五七年二月他重彈此調，以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同年五月一日，中共正式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大家以「鳴放」來幫助共產黨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中共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極盡廣開言路的表態，於是五、六月間，大陸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乃至共產黨員爭取民主的呼聲，就以星火燎原之勢展開了，其中青年學生的鳴放可謂最強音，此即新五四運動。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蘭工人群起抗暴，立刻震驚世界，十月匈牙利爆發更具規模的反共戰鬥，抗暴軍並成立革命政府，十一月蘇聯出動機械化部隊鎮壓，匈牙利不幸又被關入鐵幕。消息傳到中國大陸，各地學生咸表不滿，波匈兩國的革命行動，對大陸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間的矛盾起了催化作用。稍早，蘇共於一九五六年初即已批判史達林，旋於第二十次黨大會上正式貶史，爲舉世所注目。中共向來捧史，毛澤東更以「史達林第二」的實質面貌出現，大陸知識分子因莫斯科的鞭屍事件而清醒，加強了他們控訴毛澤東的勇氣，凡此亦爲新五四運動爆發的因素。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北平各校學生代表

在頤和園集會，商定在五月四日晚間舉行自由民主大會，用大字報、討論會等方式，公佈中共的劣跡，並創辦一個刊物，開放部分組織以吸收同學，展開更廣泛的接觸，向知名人士和各大專發出民主接力棒，以擴大社會影響等。會中還決定為顯示力量，將理論鬥爭的中心放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北京大學，以及被指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人民大學，其他各校則全力支持這兩校的活動。稍後的事實證明，這些計畫全部兌現。

兩天後，各校幾乎都舉行了五四紀念晚會，其中以北大最為熱烈，主席致詞時表示，五四精神已被扼死八年，照當權者的解釋，民主自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青年的精神業已窒息，如果抗爭的話，肉體也要毀滅，五四之家的北大學子不要再血灑廣場了，要使廣場發出民主自由的芬芳，用大家的力量，借北大的屍，還五四的魂。致詞既畢，全場掌聲雷動，高呼「五四精神萬歲」等口號，然後多人登台演講，指控中共對學術思想的禁錮，晚會至深夜才告結束。五月五日，北大學子譚天榮貼出名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強調中共的教條主義統治只是打著馬克斯、恩格斯的招牌，已轉化為自身的反面，所以大家應團結起來，組成有力的十字軍，把中共的統治翻轉過來，鞭撻至粉碎為止。這篇論文式的大字報，被視為新五四運動的誓詞(8)。譚天榮等人隨即成立「百花學社」，在哲學思想上仰承黑格爾、斯賓諾莎、恩格斯的邏輯系統，希望藉此探討中國的出

路問題，追究史達林學說的本源是否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該社在兩日內即已發展到近兩千人，後又在各校成立了分社，總社仍在北大，而於五月十九日召開代表大會，遂成為五四運動的核心組織。

百花學社創辦了「廣場」雜誌，編印了「民主接力棒」，內容要點為：(一)從理論上指出馬克思主義自一八九五年起，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產生於現時的社會主義制度。(二)匈牙利革命是人民革命，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是赤裸的唯心主義。(三)大家稱讚毛澤東，僅僅因為他是順其時，並非人民的救星或天使。(四)高舉五四的旗幟，開展自下而上的運動，爭民主、自由與人權(9)。凡此言論，果然直衝五四運動的抗議精神。

五月廿六日，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舉行聯校大集會，人民大學女生林希翎(即程海果)在會中指出，要解決大陸的癥結問題，必須根本改造中共，取消一黨專政，停止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教條化的學習蘇聯，俾使中國能在自創的社會制度下生活，擺脫恐怖的赤色暗影威脅。中共的社會主義以封建主義為基礎，是三害的根源，必須變革上層建築，才能除三害。換言之，中共政權是一套不民主的官僚機構，因此她不贊成改良主義式的整風，主張徹底變革。「人民不是阿斗，真正解決問題，只有靠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從「廣場」雜誌到林希翎的言論，顯示新五四運動的領袖們希

望以五四運動為師，將學生運動擴展成全民運動。

百花學社成立後，新五四運動即向各地伸展，北大學生訪問團分別到天津各大學串連，各校也紛紛響應，例如清華大學成立了「庶民社」，南開大學成立了「自由廣播」等，天津大學成立了「鳴放社」等，人民大學林希翎也組織了「自由論壇」，武漢大學成立了「火焰社」，並與湖北醫學院、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師專、中原大學等同時宣佈罷課，組成師生聯合陣線，重慶大學組織了「聲援北大同學會」，蘭州大學也有「赴京請願代表團」之設。總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到六月初，新五四運動普獲大陸大學生的支持，僅北大一校就提出了四千四百七十二條抨擊中共的意見。中共在驚恐之餘，開始變臉反撲，發動「反右派」鬥爭來鎮壓。據中共自己估計，右派人數高達六百萬，力量不容忽視，新五四運動參與者自為其中的精英。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其中有如下的名句：「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10)」。此處所謂「陽謀」，只是「事後孔明」的誇詞。毛澤東鼓勵鳴放的本意，在使知識分子等為其所用，結果不料反共之聲傳遍，如排山倒海般指向中共無可藥救的弱點，而且直攻其心臟。毛澤東在深感受法自斃的難堪後，只有

食言而肥，以「陽謀」自壯了，新五四運動的大學生和任何敢於直言者，都在「陽謀」之下受到殘酷的打擊。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起，大陸人民在飽受文化大革命的煎熬之餘，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北平天安門廣場進行示威活動。四月五日上午，群眾砸毀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湧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處，並衝入廣場東南角的聯合指揮部，下午更以火焚之。晚間中共民兵接到市革委會的命令後，在警察和軍隊的配合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當場屠殺人民。事後北平衛戍區動員部隊在廣場清洗了三天以上的血跡，連同被追捕的受害者多達八萬人以上。

天安門運動延續了一週，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從三月底到四月四日是群眾和平示威階段，四月五日到六日是群眾激烈抗暴階段，四月七日是中共善後處置階段⁽¹⁾。三月三十日清晨和下午，共軍第二炮兵後勤部和北平市總工會的人員，分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和南側的五四運動浮雕下，展開對中共當局迂迴的控訴。隨後數日挺身而出的，有退役軍人、老幹部、老科學家、中年教師、機關幹部、工程技術人員、青年工人、學生，以及少年與兒童等，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遊行示威，並發表演說，張貼詩句和標語，同時散發傳單。有人在廣場中央的木台上高呼：「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一小撮野心家的⁽²⁾！」獲得了群眾的熱烈響應，也燃起了新時代的五四火炬。

四月四日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多達兩百萬人次，花海人潮之中，觸目都是詩詞和條幅，其中包括：「若有妖魔與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熱血湧心潮，痛詞壯征歌，我按三尺劍，犬物敢禍國？」「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³⁾。」由此可知，運動雖以悼周的形式出現，箭頭則指向毛澤東和共產制度，這對於以「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自詡的現代暴君而言，無異最大的掌摑，證明大陸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四月五日凌晨，中共當局調集了卡車、救火車和大吊車開進廣場，沒收花圈、詩詞並擄人，清晨聞訊趕來的憤怒群眾，終於和當權派發生正面衝突。抗暴的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學生、幹部和家庭主婦，也有共產黨員、共青团員和少先隊員，他們父子相隨，兄弟結伴，夫妻同行，師生攜手，幾百萬素不相識的人們，匯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⁴⁾。五日晚間，血腥的鎮壓展開了，紅色恐怖籠罩著北平，蔓延到全大陸；此後數月，當局一直在追捕四五運動的參與者。此運動爆發在中共建立政權後的廿七年，證實了大陸人民在長期隱忍下的不甘就範，也暴露了中共統治的不穩與鐵腕的無效，它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奏起了戰歌，也為毛澤東的死亡加快了鞭子，天安門廣場正在毛澤東的臥榻之側，咫尺之處百萬民衆的怒吼，極權者也要惴惴。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訓令，撤銷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任命華國鋒為黨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明言，鄧之去職與天安門事件等有關，此說旨在倒鄧，但予世人一種「鄧小平領導義舉」的錯誤印象。其實當時鄧小平完全與外界隔絕，和事件毫無關係，此為鄧派復出後所不諱言⁽⁵⁾。誠如事件後被捕的曹志杰在答訊時陳言：「我們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人指揮，我們沒什麼後台⁽⁶⁾。」現場目擊的外國記者也指出，五日的抗暴行動顯然不是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的，而且肯定沒有打起鄧小平的旗號，記者在廣場上幾個小時，從未看見或聽到鄧的名字⁽⁷⁾。凡此皆可證明，四五運動之功與鄧小平無關。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新當權派因本身政治利益的需要，開始為四五運動平反，強調四人幫的鎮壓之舉才是反革命，「中國不是四人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只有人民才能推動歷史前進⁽⁸⁾。」其實，中國也不是共產黨的，鳴放時期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就說：「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⁹⁾。」鄧小平表面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稍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九日，即逮捕魏京生並判重刑，說明了鄧式民主的本質，也展示了中共對待知識分

子的一貫態度。

在替四五運動平反的文章中，有謂可與五四運動媲美，而規模則遠勝之：「四五運動又是一場偉大的繼往開來的青年運動。和五四運動一樣，在五四運動中，衝鋒在前的也是青年。這裏有數量眾多的青年工人，有解放軍戰士，有大學生，有中學生，有剛剛來自田野的下鄉知識青年，還有許許多多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這是一支已經比五四時大大壯大起來的青年運動大軍。」此語大致道出天安門抗暴青年的成分，然而他們的英勇表現同時却被如此認定：「四五運動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旗幟下的思想解放運動⁽²⁰⁾。」中共新當權派平反五四運動的目的之一，在和四人幫爭馬列主義的正統地位，無怪時至今日，對四項基本原則仍唱不絕，也無怪衆多參加四五運動的青年，後來成爲抵抗新當權派的民主鬥士。中共與大陸青年的距離，可由雙方對四五運動的評價互異見之，後者如何能夠忍受被四人幫扭曲的歷史真相，又被新當權派扭曲！

五四精神至八十年代的大陸，又有了舉世矚目的展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在一二九運動五十一年年時爆發了學潮，迅即蔓延大陸各地，規模之大，爲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所未曾有。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免除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職務，罪名是「在不同場合散佈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企圖擺脫黨的領

導和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辦學思想，給中國科技大學帶來極惡劣的影響，這些錯誤思想在這次科大學生鬧事中充分暴露出來」。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的「國策」，背離者可謂罪孽深重。一月十七日，中共開除了方勵之的黨籍。

此次學潮的共同口號是「要民主」和「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學並質詢中共統治的基礎，同濟大學呼籲打倒官僚主義，南京地區的學生要求打倒專制，天津南開大學建議效法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的起義，北京大學更指斥中共領袖爲暴君，中共政權「在每一方面都與我們過往最暴虐的封建君主制度一樣」⁽²¹⁾。如此激烈的言論，較五四運動或新五四運動不遑多讓。總計一個月內，至少有一百五十所大學的青年加入示威，大陸各省除了西藏和青海，均有官員匯報學潮的消息。中共惶恐之餘，在上海、南京、北平、蕪湖、武漢、青島、太原、天津和四川各省市展開逮捕行動，對象包括大學生、留學生、知識青年、工人和反共人士等，鄧小平且下令清算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作家王若望與劉賓雁也被中共開除了黨籍，益證方勵之事件並非特例。

方勵之顯然服膺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呼籲大陸知識分子挺起脊樑做人，不要唯上是從，應該自我貴重，一旦如此，力量即出。同時，大學必須是思想中心，要醞釀自由民主的空氣，培養愛好真理的意識，轉變高等教育的方向，使知識分子成爲社會進步的主導。此種蔡元培式的「民主辦學」構想，一度

獲得中共稱許，如今猛遭批鬥，其反覆無常可見。五四運動後，北京政府在學生和輿論的壓力下，不久即請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長職。中共則視學生如無物，大陸更沒有新聞自由，方勵之的回任殆不可能。他被安排到北平天文台擔任研究員，夜觀天象，擁有一片星空，在中共看來，這已經是德政了。

民主與人權的定義不止一端，方勵之的觀點接近法國的盧梭，此與五四人物略同，而時代性過之。他確信民主本身的含義，首先就是人人有自己的權利，然後組成一個社會，所以不是上面給的，是與生俱來的。人權在大陸上非常陌生，其實此說不足爲奇，即人類天生具有生存、生活、婚姻、思想、受教育等權，一如自由、平等、博愛，是自然資源，也是歷史遺產，肯定值得爭取，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由此可知，民主與人權密不可分，是天賦的，非恩賜的，但中共既已退化到黑暗時代，盧梭式的言論自如洪水猛獸。抑有甚者，方勵之公開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所謂指導總是做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確的成果。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錯」。談到好好學習，原爲學生的份內事，「但是說這一機會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是完全錯誤的」。至於深圳青年報請鄧小平退休，他認爲是很自然的現象，「我覺得這當然是大家表示的意思，是可以的」⁽²²⁾。凡此言論，在中共看來可謂大逆不道。方勵之正如魏京生，鳴鼓而攻的對象，上自馬克思，下

至鄧小平，後者既有逮捕魏京生的經驗，整肅方勵之實屬必然。

的確，從馬克思到鄧小平，都有敵視知識分子的紀錄。馬克思本人雖為一介書生，但在論及剩餘價值時，輕視精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表示，只有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時，才開始真實的分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則指出，精神勞動者逐漸形成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永遠不會錯過機會，把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加在勞動群眾肩上。因此，在馬、恩的眼光中，精神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嚴重對立，而且前者迫害後者，罪不可道。毛澤東受馬克思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他又繼承列寧和史達林的觀點，主張改造知識分子，命令他們向體力勞動者學習。及至文革期間，知識分子更名列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成為「臭老九」，身心飽受摧殘，民族生命力亦遭嚴重破壞。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充當毛澤東的助手，該年十月十九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明言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還要用懲辦和鎮壓的方法」²³，來處置數百萬名知識分子；他同時表示，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任務，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無獨有偶的是，他在一九八七年向自由化宣戰時，又強調鬥爭應該進行「至少二十年」。果如

其然，則必須借重知識分子推動的四個現代化，不但在鄧小平有生之年無法實現，公元兩千年時恐亦屬畫餅。

二、結 論

五四運動、新五四運動與四五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不同，但為政治抗議運動則一，自發性也皆無可疑，其中前二者的自發性尤強，後者則為文革受害派的共同演出。迨鄧小平上台後，將四五運動的評價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掛鉤，不免使若干人士對此運動的自發性產生尚無定論之感。曾經投身天安門抗暴浪潮的志士，對此寧可無憾？

五四運動的政治效果，至中國代表未簽巴黎和約而初步達成。新五四運動則如整個鳴放運動，其收場使知識分子覺悟到中共的不誠與無信，彼等固然獲致悲劇的命運，中共失去知識分子向心力的政治代價亦甚可觀。四五運動則加速了毛澤東的死亡和文革的落幕，鼓舞了青年一代爭取民主的信念，使他們踏著天安門的血跡勇往直前。五四運動帶動了新文化運動，四五運動揭開了日後「北京之春」的序幕，兩者皆由政治運動擴展成思想運動，而為學術界所重視。

五四運動為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表現，四五運動則偏重對民權的追求，反對秦始皇的封建社會重現即其一例，新五四運動的主張除三害亦為同例。後二者的另一共同點，是對中共當局表達強度的不滿，也都造成共產主義的

信仰危機。昔已有之，因此而烈。

新五四運動的領袖高舉五四的旗幟，希望將學生運動擴展成全民運動，但終被中共封殺。相形之下，五四運動可謂從精英主義演變到民粹主義，新五四運動本身則表現精英主義的色彩。至於四五運動，自始即為民粹主義的濃厚氣氛所籠罩。以上三種運動參與者的出身不盡相同，但主力皆為青年，「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於此獲得真切的驗證。從五四運動到四五運動，中國青年芬芳了史頁，也使得專制統治者更感到防範無力了。

至於方勵之以科學家追求民主，也使人想起五四運動的文化主張²⁴；新一二九運動澎湃洶湧，更以五四精神的再現為目標，說明了民主與科學為中國知識分子不可或忘的理想。從五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到八十年代的新一二九運動，印證了彼等追求自由之心不死，歷數十年而不衰，今後只要大陸一日不行民主，抗議的火種就一日不斷。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大學即出現了如下的大字報：「中國是一堆乾柴，只需要一點火種就可點燃。同學們！讓我們起來做火種²⁵。」五四以來的史實顯示，學生運動每為全民運動的先鋒，書生們身無半畝而心憂天下，手無寸鐵而不畏豪強，如能喚起民眾，不難扭轉乾坤。知識分子的力量似微而巨，拂逆者往往由盛而衰，甚至付出政權為代價，這是何等驚人！慘遭中共迫害至死的鄧拓，曾經如此歌唱太湖：「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

處血斑斑！」鑑往知來，或遲或速，後起的史學家必因五四精神的奏效而歌頌中華，同時歌頌中華的好兒女們。

註 釋

- (1)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原載「每週評論」第二三期，民國八年五月廿六日出版。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第三頁。
- (2) 傅斯年：「『五四』偶談」，原載重慶中央日報，民國卅二年五月四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二五七頁。
- (3) 孫中山：「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民國九年一月廿九日），收入「國父全集」第三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訂，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七十年八月再版，六七〇頁。
- (4)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蔡元培獲悉北京政府訓令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即將簽約，乃急召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告以實情，於是山東救亡示威運動，遂由北京大專以上各校，定於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門舉行。見梁啟綽：「五四運動之回憶——民國七十一年北大同學會五四紀念會講詞」，「傳記文學」二四〇期，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出版，第七頁。
- (5) 左舜生：「中國近代史話初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影印初版

，一四三頁。

- (6)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印行，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初版，三六〇頁。
- (7) 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中冊，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初版，一〇五三頁。
- (8) 唐柱國：「北平學生反共抗暴運動紀實」，台北雙十字出版社，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再版，一一一頁。
- (9) 原載「中國青年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廿二日、廿七日。引自裘孔淵：「中國大陸人民反共抗暴運動」，台北雙十字出版社，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增訂再版，一五一頁。
- (10)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四三七頁。
- (11) 「天安門抗暴事件真相」，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出版，第六頁。
- (12) 王安志編著：「天安門廣場革命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七六頁。
- (13) 另有一首詩暗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即將垮台：「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見嚴家其、高泉編著：「中國『文革』十年史」下冊，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五七八頁。
- (14) 「人民萬歲」，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廿一日。

- (15) 本報記者：「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二日。
- (16) 同註(12)，一〇九頁。
- (17) 「外國人看到的天安門事件」，香港明報，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
- (18) 同註(15)。
- (19) 引自茶陵（周玉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 (20) 本報評論員：「偉大的四五運動」，中國青年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一日。
- (21) 陳力生等編著：「野火春風——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學生民主運動紀實」，台北中國大陸雜誌社，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出版，一〇六頁。
- (22) 方勵之：「現在是誰也不怕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收入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二〇一頁。
- (23)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九月廿三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
- (24) 方勵之本人認為，五四運動全面反傳統的社會思想，文學藝術大為改觀，人文主義思潮在知識分子間廣為傳播，封建主義被碰得頭

破血流，因此五四運動的業績是偉大的。「而且這些新思潮從『五四』到抗戰一直是發展的，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人大概都會承認這一點

」。見方勵之：「誰是真民主——談政治體制改革」（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七日，在安徽省「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

上的演講），收入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同註22，一一七頁。
25 同註21，七一頁。

(一百叢書)

世界著名寓言一百篇

100 World's Great Fables (英漢對照)
陳德運 李仲 周國珍 選譯 99元

書內一百篇寓言故事，選自十六位世界名家，包括古希臘之寓言鼻祖伊索、法國詩人拉封丹、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等。

(一百叢書)

名人演說一百篇

100 Famous Speeches (英漢對照)
石幼珊 譯 張隆溪 校 198元

收錄一百篇演說詞，內容廣泛，反映哲學、文學、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問題，發表時間自西元前四百多年至本世紀六十年代，共七十多位演說家，包括蘇格拉底、拿破崙、華盛頓、林肯、甘地、列寧、羅斯福、邱吉爾等。

(一百叢書)

名人書信一百封

100 World's Great Letters (英漢對照)
黃繼忠 譯 171元

本書收一百封書信，自西元前三百多年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共八十位發信人，皆歷史上知名人物，若亞歷山大大帝、使徒保羅、富蘭克林、華盛頓、拿破崙、貝多芬等。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五五三八